

论日据时期中共与台共之关系

徐 康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研究部,重庆 400043)

摘要:目前,史学界普遍将日据时期中共与台共之关系界定为中共“指导”台共;台共领导人苏新则认为,台共虽然与中共没有组织关系,但是,思想上、政治上比较多地得到中共中央很大的领导。文章以苏新观点作为重新解读日据时期中共与台共关系的切入点,梳理中共与台共的筹建、台共一大、台共二大的特殊关系,反映中共对台共抗日斗争给予的重要帮助。台共的政治方向没有超出中共的指令范围,台共的抗日斗争是在中共的控制下开展的,中共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对台共的重要影响毋庸置疑。从这个层面看,中共对台共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这种关系形态并非偶然,而是台湾原本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共视台湾同胞为嫡亲兄弟,台共渴望台湾回归祖国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中共;台共;领导;台湾抗日斗争

中图分类号:D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5-0122-07

日据时期,台共与中共、日共、共产国际的关系错综复杂。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台共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名义成立;台共二大以后,名义上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透过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目前,史学界普遍将日据时期中共与台共之关系界定为中共“指导”台共^①。台共领导人苏新则认为,“台共虽然与中共没有组织关系,但是,思想上、政治上比较多地得到中共中央很大的领导”^[1]。苏新于1928年加入台共,台共“松山会议”被委以重任,并当选为台共二大中央常任委员。苏新以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身份,对中共与台共关系作出的判断——“领导”说——应该引起史学界的重视。笔者试以苏新及其他台共重要人物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和王万得等报告和回忆资料,证实中共与台共之关系比“指导”说更进一步,中共对台共抗日斗争发挥了实际领导作用。

一、中共与台共的筹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的,共产国际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将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殖民地台湾的革命问题上,中共和共产国际都作出了一个相同的决定——成立台湾共产党。

1925年,中共安排谢雪红、林木顺等台湾青年入读上海大学,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送他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帮助台湾建党做准备。据谢雪红回忆:(1925年)10月底,(中国)共产党组织决定派三名台湾籍青年和各省青年到莫斯科学习,一共是13人(其中台湾籍的只有2人)。出发前,党指示飞英必须入东方大学,而不必入中山大学,因为学习后准备回台建党。飞英到东方大学报到,并报告此次学习任务^[2]。

1925年11月20日,谢雪红和林木顺随中共派赴苏联学习的团队从上海启程,于同年12月18日抵莫斯科

修回日期:2014-04-12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台湾同胞抗日丛书之台湾共产党抗日斗争史”;国台办资助项目;台盟中央2014年重点出版工程

作者简介:徐康(1973-),女,四川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部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革命史研究。

^①参见何池著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台湾革命研究》(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8),张春英论文《民主革命时期台湾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之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宋帮强论文《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科^{[3]195,201}。在莫斯科期间,谢雪红和林木顺一直使用在杭州、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时的化名——“谢飞英”^{[3]167}和“林木森”^[4-5]。据中共旅莫支部于1926年1月27日统计的名册,“林木森”被编为100号,“谢飞英”被编为101号^[6],当时谢、林二人的组织关系属中共旅莫支部。中共旅莫支部由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创建,1926年夏被共产国际解散。

中共不仅派台籍中共党员谢雪红和林木顺带着“回台建党”的使命赴莫斯科学习,并交给上海的台籍中共党员翁泽生一项特殊而重要的任务:“团结组织在沪台湾青年学生,引导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实践,为成立台湾党组织准备人才。”^{[7]18}翁泽生的工作卓有成效,他领导的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作为台共建党输送了人才。

1927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日共领袖片山潜向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台籍中共党员谢雪红和林木顺传达共产国际关于筹建台湾共产党的指令:“共产国际决定命谢飞英、林木顺回国,组织台湾共产党,由谢飞英负责,林木顺协助……台共组织成立后暂时做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透过日共中央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将来才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3]233}

共产国际为何对台共与日共的关系作上述规定?在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台湾的历史背景。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后,“中国将台湾的管理权让与日本”^[8]。由于台湾尚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共产国际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决定台共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民族支部,接受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国际既没有直接在台湾成立日共的下属组织,也没有要求中共直接在台湾建立组织,而提出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是有一定道理的,为将来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归还中国留下了政治考量的空间。“台湾民族支部”并非意指台湾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其民族含义是相对于日本侵占台湾而言,凸显了台湾的汉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对立关系。“台湾民族支部”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产物。

1928年1月,日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台湾共产党暂时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之名义组党”,“日本共产党目前因为选举斗争而忙碌,有关组党事宜应请求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及指导”^{[9]9}。日共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台共与中共有割不断的关系,所以,日共领导人片山潜和渡边政之辅建议以台籍中共党员和台籍日共党员作为台共建党的基础^{[3]238},日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对台共建党工作给予帮助。

1928年2月,在中共和日共共同领导下,台共筹备委员会在上海成立^{[10]12}。台共创始人翁泽生和潘钦信致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关于台湾共产党活动的报告》写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台湾(共产)党员,被指派前往上海讨论即将成立的(台湾共产)党组织问题。因此,我们利用这次机会召集了在上海的台湾同志以及从莫斯科、日本与台湾前来的台湾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台湾(共产)党筹备委员会^{[11]325-326}。

台共筹备委员会主要讨论和修改文件。这些文件是谢雪红和林木顺在日本东京根据中共和日共文件起草的,日共中央修改审核后决定:台共以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为中心,对其他方针文件作修改^{[3]248-249[12]280}。部分在上海的台籍中共党员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王万得和谢玉叶等人负责完成了台共诸方针文件的修改和补充^{[10]12}。按照组织程序,台籍中共党员参加台共的工作,是经中共党组织批准的^{[13]350,352-353}。台共筹委会将修改后的台共文件送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审查^{[12]281}。台共筹委会与中共的联络工作由谢雪红负责^{[8]12},中共联络员到谢雪红住所取走台共文件,交中共中央^{[3]257}。

台共筹委会主要学习了日共的《政治提纲》和中共中央提供的毛泽东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台湾青年联系台湾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形势,对毛泽东的文章展开热烈讨论。据台共领导人王万得回忆:“大家对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特别感兴趣,主要针对两个问题进行讨论:一是中国有买办资产阶级,台湾有没有?二是台湾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大陆有哪些不同?”^{[10]13}中共关于阶级问题的政治观点对参加台共筹建工作的台籍中共党员及其他台湾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中共与台共一大

1928年4月15-16日^{[3]264},台共一大(即台共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代表彭荣出席大会^{[3]262[9]10}。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在台共一大上的角色,1928年11月26日,台共中央书记林木顺向共产国际报告如下:在(台共)成立大会席上,除了台湾代表以外,并有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了任△△同志领导我们的大会。此时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川崎同志因日本(共产党)中央的追迫回日,便写信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当时(共产)国际代表C同志,叫他们负责来领导我们的大会,于是4月初未能参加就回去日本了。在大会前关于党的组织、政

治两大提纲和其他各项重要提纲,都有送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看。所以我们的大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间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开成的^{[12]281}。

此外,台共领导人、创始人翁泽生和潘钦信致共产国际的报告写道:“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的领导下,日本共产党台湾支部的第一次会议就此顺利召开。”^{[11]326}台共领导人、创始人谢雪红也强调中共中央代表彭荣在台共一大上的领导身份^{[3]262}。从上述台共领导人、台共创始人致共产国际的报告和回忆史料看,中共中央受日共中央委托,领导了台共一大。

在台共一大上,中共代表彭荣介绍“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分析国共从合作到分裂阶段的革命运动历史教训,强调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9]11-12}。台共创党成员表示要汲取中共革命的经验教训。林木顺在大会上向中共代表致谢辞: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用,工农革命势力的同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重要问题,我们将遵从中国代表的指示,在实际运动中坚持努力推进,使台湾共产党不再蹈中国共产党误犯之机会主义覆辙。最后,冀望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革命,赐予最大的指导与援助^{[9]12}。

中共代表彭荣肯定台共建党的意义,指出当前台共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其一,台共应客观条件的需要而成立,其创立远离台湾的实际斗争,还没有台湾革命运动的基础,这是由于台共一大在远离台湾的上海举行,包括从台湾前来的所有党的创建者都不是参与台湾实际斗争的人而产生的差距,因此,台共党员应尽可能回台湾开展活动。其二,参加台共一大的代表没有一名工人,全是学生,在台湾革命实践中,应注意吸收工农分子入党。台湾同志认为彭荣的意见是正确的^{[3]265[11]326}。

台共的政治纲领提出“台湾独立”,希望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而回归祖国。日据时期,台湾抗日志士提出的“独立”和“光复”主张没有本质区别,独立的革命目的是“将来还是做中国的一部分”^[14],正所谓“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中国”^[15]。那么,中共对台共的“台湾独立”纲领持何态度?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为处于半殖民地的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了解同样遭受殖民压迫的台湾的特殊历史背景。“在反帝斗争、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这一共同目标上,台湾人民的利益,与祖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16]。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是适应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任务的需要,是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祖国统一的必要步骤”^{[7]32}。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对台共的“台湾独立”纲领未提出反对意见。

关于台共的青年运动方针,中共中央建议没有必要在共青团组织之外再成立无产阶级青年同盟,台共一大采纳中共建议,决定在工会与农民组织中成立青年部,以反映党对青年工作的重视,并要求党准备成立共青团组织^{[11]327}。关于台共在岛内的工会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国际远东局让中共中央提醒台共成立台湾赤色总工会,领导台湾的工人运动^[17]。所以,台共中央书记林木顺于1929年2月,从上海向岛内台共发出以《劳工阶级的阶级性结成与党的任务》为题的指令,强调阶级斗争,要求台共组建以左翼力量为中心的台湾总工会。对于这个意见,岛内台共中央原则上是认同的,但考虑到岛内已有台湾民众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台湾工友总联盟,如果即时组织以左翼工会为核心的台湾总工会,将会分散台湾的工会力量,不利于联合岛内所有抗日力量与日本殖民当局抗争,所以,岛内台共中央认为台湾赤色总工会的组建宜延后^[18]。

台共一大产生了党的中央机构。林木顺、蔡孝乾、林日高、洪朝宗、庄春火当选为台共中央委员,谢雪红、翁泽生当选为台共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4月18日,台共召开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候补委员翁泽生负责联络中共中央^{[3]266[9]93}。1928年4月20日,台共第二次中央委员会讨论台共建党宣言,并草拟致中共中央的感谢信。信中写道:台湾共产党的构成分子大部分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训练。是故,台湾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关系),台湾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亦有颇多关联。因此,恳请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共产党能多加指导与援助。这是大会全体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热烈的要求^{[9]98}。

感谢信从具有中共、台共双重政治身份的党员组织关系角度,阐明台共与中共之间的特殊关系。据谢雪红回忆,台共第一批党员共18人^{[3]262}。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其中的台籍中共党员有11人,台共一大当选的所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均为中共党员(表1)。所以,中共的革命理念和政治路线对台共产生影响是自然而然的。

日据时期,与日本殖民当局作斗争,渴望台湾回归祖国,是包括台共在内的全体台湾抗日精英的共同理想。台共领导人谢雪红和林木顺早年参加中共领导的“五卅”运动,提出“收复台湾”,得到大陆同胞的积极响应^{[3]176}。具有中共和台共双重政治身份的林木顺、翁泽生、潘钦信、蔡孝乾和杨春松等人,在祖国大陆参加中共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台共与日共联系中断后,台共党员“请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他们”^{[13]352},希望中

共中央派遣闽粤籍中共党员参加台湾岛内的抗日斗争^[27]。台共党员以革命实践证实了台湾与祖国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此即台共一大致中共中央感谢信所强调的台湾与祖国密切关系的深层涵义。

表1 具有中共、台共身份的台籍党员概况表(不完全统计)

姓名	加入中共时间	加入台共时间	台共党内地位	备注
林木顺	1925年 ^[19]	1928年	台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常任委员,书记	
谢雪红	1925年 ^{[19][10]3}	1928年	台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为中央委员	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翁泽生	1925年 ^{[20][13]350}	1928年	台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蔡孝乾	1925年 ^{[10]7[21]86[21]}	1928年	台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常任委员	1950年被台湾当局逮捕,叛变
林日高	1926年 ^{[23]293}	1928年	台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常任委员	后被开除
庄春火	1926年 ^{[10]10}	1928年	台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后被开除
洪朝宗	1926年 ^{[10]7}	1928年	台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后被开除
谢玉叶	1926年 ^{[21]93}	1928年		
李晓芳	1926年 ^{[10]10}	1928年		
潘钦信	1927年 ^{[10]11}	1928年	台共二大当选为中央常任委员	
庄泗川	1927年 ^{[10]7[3]262}	1928年		
王万得	1927年 ^{[3]241[21]160}	1928年	台共二大当选为中央常任委员,书记	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苏新	1948年 ^{[1]75}	1929年	台共二大当选为中央常任委员	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杨春松	1926年 ^[24]	1928年		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简吉	1948年 ^[25]	1929年		
曾明如		1931年		抗战胜利前后,在北平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志忠	1931年 ^[26]			1932年,奉翁泽生之命返台重建台共党组织

注:资料主要来源于谢雪红《我的半生记》、杨克煌《我的回忆》、王万得《台共回忆》、苏新《未归的台共斗魂》、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社会运动史》等。

三、中共与台共二大

1929年4月,日本当局对日共展开的“四·一六”大逮捕,使日共受到重大破坏,导致台共与日共的联系中断^[28]。1930年4月,岛内台共中央第一次派代表林日高赴沪联络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同年5月,林日高以书面形式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台湾革命情势和台共现状,这份报告的观点受到中共和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影响^{[23]294}。其后,中共联络员“刘同志”向林日高转达中共对台湾革命的意见^{[29][9]111}。同年8月,台共党员陈德兴奉命赴沪,同年夏秋拟了一份关于台湾革命情势的报告^[30]。1930年10月20日,台共党员翁泽生和潘钦信在林日高和陈德兴报告基础之上,以《关于台湾共产党活动的报告》为题,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台共组织成立及发展的经过情形,并指出岛内台共存在的一些问题^{[11]324-331}。1930年5至10月,台共数次向中共呈报台湾革命情势,与中共来往频密。此时,台共如何看待与中共的关系?台共领导人翁泽生向远东局道明实情后,远东局工作人员记录道:“台湾人请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他们”^{[13]352}。

1930年10月底,台湾雾社起义爆发之后^[31],经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会见台共党员翁泽生、潘钦信和陈德兴。瞿秋白针对林日高、陈德兴、翁泽生和潘钦信等人关于台湾抗日革命斗争情势的报告,对台湾革命作出具体指示。翁泽生称,瞿秋白的意见不仅仅代表中共中央,也转达了远东局的意思^[32]。瞿秋白说:台湾(共产)党……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尽早解决;因此,有必要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检讨第一次代表会议(即创党大会)所议决的纲领与战术,并建立新的布尔什维克纲领与战术……召开这次会议需要获得共产国际的同意。虽然你们现在与中国(共产)党有所联系,但处理台湾(共产)党的各种问题,并不是单靠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就可以解决。因此,我们只给予你口头(非书面)的劝告

(非命令),紧急会议需以日本共产党民族支部的名义召开。至于共产国际与你们的关系,则应透过中国(共产党)建立^{[33]394}。

中共中央代表瞿秋白建议台共以日共台湾民族支部的名义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以解决台共目前面临的问题。瞿秋白之所以申明只对台共作口头建议,正是基于台共与日共特殊关系的考量,表现出中共领导人对台共的关怀,对台共、日共及共产国际的尊重,对当时革命斗争的高瞻远瞩。中共领导人承认台共与中共之间存在联系,同时指出台共的问题不能仅靠中共来解决,还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瞿秋白强调,台共应该透过中共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台共的相关报告需要由中共送交共产国际审查批准,台共每月应向中共汇报一次工作^{[33]397,398}。由此可见,在处理台共的问题上,中共表现得比较积极。其实,中共的积极反应与台湾原本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有必然联系,体现了中共对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的关切。

中共中央指出,现阶段台湾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工农政府,台共要建立统一战线,领导台湾工农和劳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向台湾民众公开党的纲领原则,大力组建党支部,党的领导机构要由工人或获得工人阶级信任的同志组成。中共中央对台共的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共青团组织及支持和动员台湾少数民族开展抗日斗争等作了具体指示,希望台共消除机会主义,发行大众刊物,并强调支持中国苏维埃政权,反对干预中国革命,反对日本出兵中国,是当前台共十分迫切的任务^{[33]395-397}。中共中央的意见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认同。远东局稍后发出《致台湾共产主义者的信》^{[34]453-460},其观点与中共中央基本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受当时共产国际及中共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共中央代表对台湾抗日革命作出的口头建议,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1930年11月20日,台共党员陈德兴回到台湾^[35],向岛内同志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

1931年3月,潘钦信奉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令返回台湾^[36-37],5月初成立台共二大筹备委员会,委员包括王万得、潘钦信、苏新和萧来福^{[10]44}。筹委会对潘钦信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重新起草的台共《政治纲领》^[38]进行讨论,略作修改后,由苏新负责誊写。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台共二大召开,与会代表包括王万得、潘钦信、苏新、萧来福、庄守、颜石吉、简娥、刘守鸿等8人。潘钦信以共产国际派遣员的身份,向台共二大代表报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台湾革命的指示。台共二大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台湾抗日革命的意见,通过新的《政治纲领》,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王万得任台共中央书记,中央委员包括王万得、潘钦信、苏新、颜石吉、刘守鸿,肖来福、简娥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9]162-165}。

对照台共一大和台共二大的政治纲领口号,相似之处包括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获得独立,土地归还农民,台湾革命与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密切相联等;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台共一大提出“建立台湾共和国”^{[9]35},台共二大则提出“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另外,台共二大新增“没收帝国主义一切的企业及银行,国内民族一律平等”^{[9]170-171}等适合台湾革命情势的纲领口号。

1931年6月3日,新的台共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对有关工作进行安排,并致中共中央感谢函:大会于特派至(共产)国际的同志携回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友谊性提议后,抱着布尔什维克的满腔的诚意,经全场一致通过,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提议,反对机会主义,努力于布尔什维克工作的实行,积极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以完成革命现阶段的任务。大会确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将提供台湾(共产党)重大的教训与参考。党的成立大会及此次大会均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指导……大会一方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提议,确立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针与政治方针,努力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工作;同时希望,中国(共产党)时刻以其丰富经验帮助台湾(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并建立与台湾(共产党)的密切联系^{[9]167}。

台共致中共中央的感谢函,阐明中共革命经验对台湾革命的重要价值,强调中共对台共一大和二大产生的重要影响,希望继续得到中共的帮助,并表示要与中共建立密切的联系。日本殖民当局确信中共政治路线和革命思想对台共二大通过的新《政治纲领》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9]170}。以中共中央对台湾革命指示为蓝本拟制的台共新《政治纲领》,其确定的政治路线和抗日策略比台共一大的《政治纲领》更加激进,可以窥见台共对台湾抗日革命的高昂斗志,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台共新《政治纲领》烙下了共产国际及其影响下的中共“左”的政治路线印记。台共二大以后,台共名义上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但是,实际上是通过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领导^[11]。台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大力推展台湾工农运动,在与日本殖民当局面对面的斗争中取得了一定成果。1931年6月下旬,日本殖民当局开始施行对台共的全岛性大逮捕,台共遭到重大破坏而解体。

四、结论

中共与台共之关系甚密,早在1925年,中共已决定帮助台湾建党,并为实现这一计划而积极准备;1927年共产国际决定成立台共后,台共筹备委员会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成立,台共一大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召

开,中共中央对台共二大的《政治纲领》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要求台共定期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进程。此外,中共派联络员“刘同志”及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与驻沪台共联络员翁泽生密切联系^{[39][9]140},中共中央组织部等机构及时掌握了台共的有关情况^{[9]132}。从台共党员的组织关系看,绝大多数创党党员同时具有中共党员的身份,并有相当一部分台共党员始终在中共的领导下从事反帝爱国运动。总之,台共的筹备、诞生和发展与中共密不可分,中共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思想贯穿于台共抗日革命斗争的全过程。

老台共苏新分析台共与中共、日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复杂关系时,称台共是“三不像”的怪物,亦即:“说它是日共的一个支部,不像;说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不像;说它是中共的一部分,但又没有组织关系,也不像。”^[1]虽然共产国际的固执己见,导致中共与台共之间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台共在思想和政治上得到中共中央很大的领导。台共的政治方向没有超出中共的指令范围,台共的抗日斗争是在中共的控制下开展的,中共对台共抗日革命斗争发挥了实际领导作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共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早期支持台共抗日的观点一脉相承。

为何中共党史没有包括中共支持和帮助台共抗日革命斗争的重要历史?当前,史学界普遍将中共与台共之关系界定为中共“指导”台共,所以,中共党史自然没有必要将其纳入。然而,随着对档案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当年中共与台共的关系或许需要重新解读。笔者尝试再次将老台共苏新关于中共领导台共的观点提出来,阐明这种关系形态并非偶然,而是台湾原本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共从未放弃使台湾回归祖国的奋斗目标,台共渴望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必然结果。希望本文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当年中共对台共及台湾抗日革命斗争的支持和帮助,理解台共党员爱国爱乡的情怀和义无反顾追随中共的决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这种天然的血缘纽带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断”^[40]。两岸同胞只要携手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必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祖国的宝岛台湾前景会更美好。

参考文献:

- [1] 苏新. 未归的台共斗魂[M].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129.
- [2] 谢雪红回忆. 北京资料[R]. 1982.
- [3] 谢雪红(口述). 我的半生记[M]. 杨克煌,笔录. 台北:杨翠华出版,2004.
- [4] 上海大学录取布告[N]. 民国日报,1925-09-06.
- [5] 林炳炎. 林木顺与台湾共产党的创立[M]. 台北:林炳炎出版,2013:59.
- [6] 中共旅莫支部名册[R]//俄罗斯档案. 原中共旅莫支部成员后人提供,1926-01-27.
- [7] 何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台湾革命研究[M]. 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8.
- [8] 伍俐斌.《马关条约》是否“割让”台湾给日本之考辨[J]. 台湾研究,2013(3):63.
- [9]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 台湾社会运动史Ⅲ共产主义运动(1913-1936)[M]. 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
- [10] 王万得回忆. 北京资料[R]. 1982.
- [11] 翁泽生,潘钦信. 关于台湾共产党活动的报告(1930年10月20日)[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
- [12] 林民威(林木顺). 台湾共产党组织的经过和现状(1928年11月26日)[M]//林炳炎. 林木顺与台湾共产党的创立. 台北:林炳炎出版,2013.
- [13] 远东局女工作人员与翁泽生、潘钦信的谈话记录(1930年11月26日)[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李随安,译. 台北:台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
- [14] 黄玉斋. 台湾抗日史论[M]. 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333.
- [15] 李友邦. 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中国[J]. 台湾先锋,1940(1):7.
- [16] 李稚甫. 台湾人民革命斗争简史[M]. 广州:华南人民出版社,1955:141.
- [17] 翁泽生致远东局的信(1931年2月14日)[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408.
- [18]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 台湾社会运动史V劳动运动(1913-1936)[M]. 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129.
- [19] 谢雪红自述. 北京资料[R].
- [20] 萧彪. 翁泽生[M]//胡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7卷.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141.
- [21] 何池. 翁泽生传[M]. 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
- [22] 李宣锋,魏永竹. 当事人蔡孝乾家属马雯鹓暨蔡艾安访谈记录[M]//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二)个案资料. 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62.
- [23] 翁泽生的补充说明(1930年5月12日)[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

- [24] 杨国光. 一个台湾人的轨迹[M]. 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31.
- [25] 杨渡. 简吉——台湾农民运动史诗[M]. 台北:南方家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253.
- [26] 吴克泰,蓝博洲. 隐蔽战线的传奇英雄——张志忠烈士[J]. 军事历史,2002(2):59.
- [27] 翁泽生致远东局的信(1931年1月28日)[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382.
- [28] 林日高的报告(1930年5月)[C]//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286.
- [29] 翁泽生致远东局的信(1931年2月17日)[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412.
- [30] 陈德兴的报告(1930年夏秋)[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319.
- [31] 翁泽生致远东局的信(1931年2月1日)[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389.
- [32] 翁泽生致远东局的信(1931年2月3日)[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393.
- [33] 翁泽生. 瞿秋白与翁泽生、潘钦信及陈德兴的谈话记录(1930年10月)[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历史研究所,2010.
- [3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致台湾共产主义者的信(1930年、1931年交替之际的冬季)[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李随安,译. 台北:台中研院历史研究所,2010.
- [35] 陈德兴的信(1930年12月末)[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400.
- [36] 曾明如. 曾明如回忆录(三)[J]. 天津台讯,1989(3):9.
- [37] 杨克煌. 我的回忆[M]. 台北:杨翠华出版,2005:96.
- [38] 潘钦信致翁泽生的信(1931年4月28日)[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历史研究所,2010:511.
- [39] 翁泽生致远东局的信(1931年1月13日)[M]//郭杰,白安娜.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 陈进盛,译. 台北:台中研院历史研究所,2010:365.
- [40] 李寒芳.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连战一行时强调,真诚希望两岸同胞共圆中国梦[N]. 新华每日电讯,2013,2(26):1.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CP and TCP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XU Kang

(Research Department, Chongqing Hongyan Revolutionary History Museum, Chongqing 400043, P. R.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by the history circle that the CCP “had guided” the TCP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ut Su Xin, leader of the TCP, held the view that “the TCP was led by the CCP more ideologically and politically, although there was no organiza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m”. Based on his view,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relation between CCP and TCP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y study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s of the CCP, the inception of the TCP, the first and second TCP congresses, and CCP’s important assistance for TCP’s anti-Japanese struggle. The political direction of TCP was not beyond the instruction of CCP, the TCP’s anti-Japanese struggle was under the control of CCP, and TCP was influenced by CCP’s political line and revolutionary policies doubtlessl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CCP’s leadership to the TCP could not be ignored. This relation was formed not by accident, but as the inevitable results of Taiwan’s being China’s inherent territory, the CCP’s treating Taiwan compatriots as blood relations brother, and the TCP’s longing to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Key words: the CCP; the TCP; leader; Taiwanese anti-Japanese struggle

(责任编辑 彭建国)